

造業陷入持續性頹勢。在全球高端製造領域，日本的優勢持續弱化：汽車產業方面，日本汽車全球市場份額從2010年的17.8%下滑至2025年的13.2%，被中國、韓國逐步超越；電子產業方面，日本在半導體、智能手機等領域的市場份額大幅萎縮，曾經的行業巨頭如索尼、松下等，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持續下降。少子老齡化導致勞動力枯竭、生產效率停滯、新興產業布局滯後、企業造假頻發等問題，進一步加劇了製造業的衰退困境。偏偏，國際形勢變亂交織，硝煙四起，武器需求急速上升。兩種因素的結合，形成了高市早苗的「軍工經濟」政策內外動因。

事實上，「軍工經濟」推出後，也見到短期效應。日澳11艘軍艦訂單落地後，日本三菱長崎造船廠的產能利用率從原來的30%飆升至95%以上，川崎重工、IHI等軍工巨頭的訂單量大幅增加，企業營收與利潤顯著提升；同時，帶動了鋼鐵、電子、精密機械、材料等上下游產業的發展，相關企業的產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預計未來5年日本軍工產業及相關領域將新增就業崗位10萬個以上。根據日本防衛省的預測，武器出口全面解禁後，日本每年將新增軍售銷售額2萬億日元（約130億美元），可直接拉動GDP增長0.2-0.3個百分點。然而，「軍工經濟」無法醫治日本製造業的根本病灶。

首先，日本製造業頹勢的基礎誘因是少子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與內需萎縮，而「軍

工經濟」無法改變日本的人口結構。軍工產業雖然能創造部分高技能就業崗位，但無法解決勞動力總量不足的問題；同時，軍工產業的發展主要依賴國際市場需求，無法拉動國內民用消費需求的增長，難以破解「內需萎縮—企業停滯」的惡性循環。此外，軍工產業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較高，無法吸納大量普通勞動力，對整體就業的帶動作用有限，無法從根本上緩解日本的就業壓力。

其次，日本製造業的核心問題是產業結構單一、老化，新興產業布局滯後，而「軍工經濟」會進一步加劇產業結構失衡。一方面，日本軍工產業高度壟斷，90%的軍售訂單流向三菱、川崎等七大財閥，絕大多數中小民用製造企業無法享受軍工出口的紅利，反而會因資源向軍工產業傾斜而被進一步邊緣化，導致民用製造業持續空心化；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將大量資源投入軍工產業，擠壓了新興產業的研發與發展空間，導致日本在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產業結構的老化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第三，無法解決核心技術依賴的問題。日本軍工產業的核心技術（如宙斯盾系統、MK41垂發、導彈技術等）高度依賴美國，自主研發能力不足。日澳軍艦項目中，美國拿走了核心技術的大部分利潤，日本僅獲得20%-30%的組裝與建造利潤，本質上是美國軍工的「下游代工廠」。這種核心技術依賴，導致日本無法形成獨立、可持續的高端製造

競爭力，即便通過軍工出口獲得短期利潤，也無法推動製造業的技術升級，無法從根本上提升日本製造業的全球地位。

第四，無法緩解財政危機，反而加重負擔。日本國債佔GDP比重已突破260%，財政收支失衡問題嚴峻，而「軍工經濟」不僅無法緩解財政危機，反而會加重財政負擔。高市早苗政府為扶持軍工產業，需要投入巨額的研發補貼、產能升級資金，同時還要舉債擴大防衛預算；此外，武器出口的前期投入巨大，回收周期長，若國際形勢變化，軍售市場停滯，日本政府將面臨巨大的財政風險。「舉債發展軍工」的模式，本質上是寅吃卯糧，最終會讓財政危機進一步惡化。長期而言，軍工產業的高度壟斷與資源傾斜，會導致日本製造業的資源配置進一步失衡，傳統民用高端製造產業（如汽車、電子）的競爭力持續下降，新興產業無法得到有效發展。

事實上，高市早苗的「軍工經濟」不是什麼「新策」，本質是二戰日本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全面推行軍國主義的翻版。當下，高市早苗在政治方面，也大力鼓吹和實際推動修改「和平憲法」，日本的周邊國家以及印太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在密切注視着高市早苗的一舉一動，看她是否一步一步滑向罪惡的深淵。



掃碼閱讀原文